

# 奔跑吧，零工

□ 刘言

一个比灌木丛高不了多少的小女孩倒在灌木丛里，成千上万的人为她揪起了心。

刚刚过去的周末，一段网络视频广为流传。画面中，一个小女孩被一女子用自行车3次撞倒在马路边的绿化带里。小女孩爬起来，捡起自己掉落的发箍后，又被女子左右开弓抽了4个耳光。

观者又惊又怒，质问是什么人对一个孩子如此使用暴力。有网友称，该女子乱丢垃圾被小女孩捡起，恼羞成怒打人。有人甚至在朋友圈悬赏1万元，寻找这名施暴女子。

随后，西安警方发布通报称，经核实，视频中成年女子与小女孩系母女关系，事情发生在6月5日，女儿扰乱课堂纪律并与其他学生发生纠纷，母亲被学校两次约谈，愤而被骂体罚。

警方表示，已对该女子进行批评教育，责令其带女儿去医院就诊，同时告知该女子教育子女要注意方式方法。该女子表示已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，以后坚决改正。

这场当众发生的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暴力，如果发生在素不相识的人身上，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，殴打他人的，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要被处以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；当被殴打、伤害的对象是残疾人、孕妇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时，施暴者要被处以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。

而当它发生在母女之间时，结果是批评教育以后坚决改正。不少网友担心，小女孩逆来顺受的姿态和木然的表情，可能意味着她不是第一次承受类似的暴力。

有研究表明，儿童期遭受情感和躯体虐待的孩子，往往会出现智力发育迟缓、语言发育迟缓和学业表现失常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这往往会影响儿童对于社会的认知，他们更容易把交往对象知觉为敌意的、难以信任的，遇到挫折时更多表现出激烈、固执、缺乏同情等负面情绪。

老话讲，三天不日上房揭瓦，棍棒下面出孝子。类似的教育理念如今仍不缺市场。全国妇联2013年出版的《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》显示，中国家庭中，10-17岁儿童遭到父亲和母亲家暴的比例分别为43.3%和43.1%。

我常常在朋友圈里看到，辅导孩子作业的家长发布“忍住，不能动手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他们的火气，真正动手的并不多，有些还要反复忏悔。仔细想想，那些以不娇惯、为名对孩子实施的暴力，多少是因为父母自己不爽，甚至是因为自己人生不努力、不成功，把孩子当成发泄的对象，寄望孩子做到自己做不到的事。也无怪今年两会上，有政协委员提出建议，家庭教育应尽快立法，让父母持证上岗。

家长有管教孩子的权利与义务，但突破必要限度的体罚甚至是虐待，会触犯法律。我国刑法规定，经常以打骂、冻饿、捆绑等方式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进行肉体上、精神上的摧残、折磨，情节恶劣者，涉嫌构成虐待罪，要被追究刑事责任。

2018年年底，有一个8岁女孩的遭遇引发全网关注，她的父母受到了法律的惩罚。女孩家中的摄像头拍下她写作业和吃饭时被父母掌掴、揪头发，以及父母用扫帚、塑料椅子等坚硬物品殴打她的画面。甚至她弟弟趁父母不在的时候也有样学样，对女孩抓挠殴打。

视频里的女孩被打后镇静得让人心碎。她默默捡起作业本，重新坐回椅子，不哭不躲，不吵闹不反抗。经过警方核查，那对父母对殴打女儿的事实供认不讳，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当地妇联为女孩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，并安排专业社工对女孩进行陪护和心理辅导。

不过，相关法规也指出，有的父母教育子女方法简单、粗暴，有时甚至打骂、体罚，这种行为是错误的，应当批评教育，只要不是有意对被害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摧残和折磨，不应以虐待罪论处。

在上周末发生的事件中，涉事女子在大街上就能大打出手，在看不到的地方，女孩又会有何种遭遇？在母女之间，这种行为发生的频率如何？女孩的身心健康状况是否受到影响？这些细节不仅影响着事件的定性，也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，从而进一步跟进调查，依法处理。

就在不久前，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监委、公安部等九部门会签下发了《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》，明确国家机关、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，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，对性侵、虐待、欺凌、拐卖等九类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有报告义务。

随着相关法律不断完善，相关制度建立健全，我期待类似的事件不再依靠网友的曝光才被关注，期待受到伤害的孩子能够尽早得到帮助，期望着下一次，当暴力又试图披着血缘的盔甲伤害孩子时，扬起的巴掌会遭到强硬的抵抗，以法的名义。

他逐渐明白，任何一种工作，想要真正做好都不简单。晚上送餐时，他看不清楼栋号，就买了支手电筒。为了防止洒餐，他买了固定餐盒的夹子。

在广州，每次遇到天桥，为了避免倾斜洒餐，李江天都要把餐箱取下来，先抱着过桥，再回来推车。

除了辛苦和收入，新职业也给他们带来了出圈的机会。成为代驾后，翟一帆开过各种各样的豪车。他提前做了功课，把很多车型的挡杆、手刹，甚至车灯开关的位置，记到了自己的手机上，空闲时就拿出来翻看。

来上海近4年，陈珂就像一个陀螺，在住所和公司之间的线段上往返。他眼中的上海，只是线段两端方圆3公里内的样子。

送外卖让他重新认识了这座城市。有时刚从一个单价15万元左右的高档住宅出来，下一单就进入了一个老小区，里面打隔断，一个隔间里还摆两张高低床、住4个人的那种。还有人一天三顿都叫外卖，门口堆满垃圾，家里搞得像网吧。

这种强烈的反差有时会让他感到恍惚，但又无比真实。一天下午，上海忽然下起暴雨，乌云笼罩下，整座城市宛如黑夜。他提前收工回家，然后打开应用，翻看自己一天的收成。他发现，在这样风雨交加的天气里，有人点了麻辣香锅，有人点了奶茶，有人点了水果，每一单的背后都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，是最真实的生活。

我每天都接触形形色色的人，看到各个阶层的生活。看的多了，自己慢慢也有了平常心。陈珂说自己打消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想象，也不会再轻易怨天尤人。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并且相信双脚正扎扎实实地踩在路上。

在郑州，连续3天过了零点接到派单后，翟一帆终于走到酒店门口。目标顾客越来越近，他向前一步，试着模仿从老代驾那里学来的姿态、语气：您好，请问您需要代驾吗？

对方回过话，礼貌地笑了笑，然后摆手。这单没有成功，却让翟一帆多了一些信心。

客人很礼貌，让我觉得对方是尊重我的。他忽然发现，别人并没有看他，是我自己看不起自己。

后来与朋友聚餐时，他主动提起了自己的新职业，并且现场打出广告，以后喝了酒，都找我代驾。

现在，父母几乎每天会主动问起，昨天跑了多少单，几个同事也向他打听新工作，考虑入行。

他逐渐找到这份工作的乐趣，上岗不过半个月，除了跑车，其他牌子的豪车基本都开过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见识了许多中年男人最真实的一面。酒后，他们更愿意在陌生人面前卸下防备。

他发现在郑州这座城市，晚上喝完酒叫代驾的顾客里，有一半都是搞工程的，打开后备箱，就看到里面放着的白色安全帽和荧光背心。

他曾接到过一个路虎车主的代驾订单，平台要求代驾司机不能打扰乘客，上车后两人礼节性地相互问好，就再无交流。

你这行现在干着咋样？一阵沉默后，有些醉意的车主主动发声。

那个看起来事业有成的顾客瘫坐在后排，声音低沉，慢慢讲起生意遇到瓶颈，每天筋疲力尽，又不想把情绪传递给家人。

翟一帆开始只是安慰，不一会儿，两个男人就互相倾诉起苦闷。

这单结束后，翟一帆忽然觉得轻松了许多。他发现，不管有钱还是没钱，新鲜还是落魄，每个人在不同时期都有自己的压力、困境，自己遇到的这些事算不了什么。

翟一帆的公司还没重新开张，但他已经决定把代驾作为长期的副业，什么时候干都能多一份收入。

李江天考虑辞掉推销员工作，做全职外卖骑手。只是他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：零工经济目前还缺乏保障。这是种新型的劳动关系，一般都不会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，因此社保还没有完全覆盖。

6月初，陈珂的公司终于复工了。他再次回到工位上时，已经有了不同的感觉。他拿出从前拟好的、已经落灰的职业规划，在下一项待办事项里打上一个重重的记号。

他没有把电瓶车退租，周末时又重操旧业。只是这一次，他已经不再在乎周围人的眼光。



陈珂在给马拉松志愿者做培训。

家人是最重要的保密对象。他们每次跟街坊谈起自己的儿子在上海有个正式工作时，都很骄傲。陈珂也理解，在河南农村，一个重点大学毕业的孩子只有如此，才叫有出息。如果他们知道我现在在送外卖，可能会疯掉。

广州外卖骑手李江天的上一份工作就是销售。跑单期间，他关闭了朋友圈，没人愿意跟一个外卖骑手谈生意。

送到第十九天时，陈珂的日收入第一次突破了300元。

那天收车后，他买了两杯星巴克犒劳自己。春节前，这是他最想喝的饮品，现在看着握在手里的咖啡，他首先想到的是需要送10单外卖才能买到。晚上到超市买菜，猪肉的单价是每斤5单外卖。

不管是送外卖，还是代驾，跑完一单就马上能看到自己刚刚挣到的钱，这种收入模式几乎改变了陈珂和翟一帆的消费观。

以前工资都是按月发，感觉钱还不少。现在每天在手机上看到自己的收入，感觉那都是辛苦钱。翟一帆笑着说。

做代驾前，他每天下班后，不是与朋友聚餐，就是在家打游戏。现在，晚上7点半，他会准时带上折叠电动车出门，开始一天的工作。最晚的一次，到家时已经天亮。

陈珂每天要走超过1.5万步路，爬50层楼。最惨的一次，他碰到一个小区电梯维修，只好一口气爬到12楼。

在做骑手的第二十五天，他的膝盖在反复上下楼梯后，歇菜了。长期跑步的经验告诉他，膝盖有了积液。他不得不在床上躺了3天，才逐渐恢复过来。

之前他也在网上看到过，有骑手因为订单快要超时，在电梯里急得哭出声。有时自己点外卖，也会碰到火急火燎的骑手，一边把餐递过来，一边摆出离开姿势。那时他觉得自己这些都有点夸张，不就是单外卖，怎么能这么着急。

以前只知道外卖小哥很辛苦，但没有真正在意他们的处境。陈珂说自己以前是点外卖的，现在开始送外卖，换了位置，才更理解双方。

他记得有次同事点外卖，晚到了半个小时，对着骑手暴跳如雷。骑手没有解释机会，只能不停地对不起。当时陈珂也在场，但他没说什么，甚至觉得同事教训得好。

他可能像我一样，车子没电了，也可能只是餐厅出餐慢。现在，陈珂开始理解那个骑手的遭遇了，自己犯了错却没那个办法弥补，很难受。

做骑手后，陈珂最怕的就是送餐途中接到顾客电话。打电话就说明对方已经忍耐一会儿了，我不是怕客人给我差评，而是这样的电话会让人觉得，这件事没办好，对不起人家。

车，随即打消了念头。外卖骑手成了他的最佳选项。对陈珂来说，从事这个职业需要投入的一笔最高成本，只有不到200元。一套新的头盔、骑手服，再加上餐箱。电动车可以租，每天10元。

装备到手，再经过两天的线上培训后，陈珂拥有了一个新身份：饿了么外卖小哥。

即使身无分文，有人也可以零成本入行。在广州，因疫情待业甚至负债的李江天，所有的工具只是一部手机和一个用了4年的旧书包，他靠着地铁、公交和共享单车就开始了跑单。

翟一帆选择了当代驾司机。这个职业要求有5年驾龄，并且有熟练的驾驶技术，因此比起外卖员，年龄门槛也偏高。

在滴滴代驾的面试现场，翟一帆与50多个中年男人聚在一起。这些未来的同行原本来自各行各业，有搞车托的、卖建材的，还有开货车的。

大家戴着口罩，没有太多交流，但眼神接触的瞬间，他立即就能读出对方的状态，焦虑、疲惫，和我一样。

陈珂、李江天和翟一帆在选择新职业时，都做好了随时回到原工作岗位的准备。他们都清楚，不管是外卖骑手，还是代驾司机，这些零工的退出成本都和进入成本一样低。

他们的选择不仅是一时的应变之策，也是一种趋势。世界银行在《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》中提到，未来劳动力市场将日益变成零工（Gigs），而不是工作。

事实上，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临时工作（包括零工）在工业经济体系中的占比就开始上升，这是由不断变化的供需关系决定的。

如今，提供按需服务的行业越来越多。在技术的加持下，陈珂、翟一帆们不过是作为劳动力资源，进入互联网平台，然后快速配置到了最需要的地方。

上岗第一天往往是艰难的。第一天送餐时，陈珂碰到一家出餐慢的饭馆，因为太过着急，他把塑料袋上的46看成了49。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，商家突然打来电话，告诉他拿错了单。

他只能原路返回、换餐，再把外卖送到顾客手中时，已经超时近20分钟。这次紧张的送餐过程，最终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收益，只换来站长一通责骂。

因为不熟悉流程，这天陈珂路没少跑，却只送了7单，收入39元。最后一单送到一半时，电动车电量耗尽，他只能把车子停到路边，骑共享单车跑完了最后5公里。

对于每月少收入的1万元来说，这些止损还远远不够。待业期间，陈珂拥有最多的是大把的时间。他想把这些时间利用起来，尽可能转化成收入。

当时不知道疫情还要持续多久，那几个月本来应该正常工作的，靠的就是出卖时间或者体力、脑力来赚钱，我不能把时间浪费了。

原来的行业没有工作机会，他开始关注那些门槛不高，又能快速上手的工作。他考察过快递员，最终因为时间不够自由放弃。他也注册过滴滴司机，但又不相信自己的车技，再加上没

来到客户门前，他已经满头大汗，双腿软到差点没跪下。他不断向门缝里伸出的脑袋道歉，完成订单后一边自责，一边慢慢挪到小区门口。

站在路边，他感觉自己累到再也迈不出半步，不得不忍痛奢侈了一把，打了辆滴滴。他给司机指路，先开到电动车停放的地方，卸下电瓶和餐箱，装进后备箱。

你们外卖小哥现在下班都开始打车了？司机从后视镜里盯着还穿着骑手服的陈珂，一脸疑惑。

陈珂苦笑，把一天的遭遇分享给面前的陌生人。话音刚落，司机抬手在手机屏幕上划了一下，结束了行程。

小伙子，咱们都不容易，剩下的路就当送我回家了。

坐在后排的陈珂侧过脸，眼泪没出息地流了下来。自己跑了一整天，收入不到40元。如果再除去车费，当天几乎等于白干。

他不知道自己的眼泪到底是因为尝到辛酸，还是感到温暖。待业的几个月里，他遇到过更大的委屈，和更多的感动，但这是他唯一一次流泪。

翟一帆上岗的第一天也不轻松。晚上7点，他来到系统指派的新手区域，等待第一单生意。他把手机攥在手里，忍不住频繁刷新派单信息。20分钟后，手机的震动从手指快速传递到大脑，这几乎让他打了个激灵，第一份订单来了。

系统显示，自己距离客人3.6公里。他知道客人叫代驾时，酒席一般已经散场，不会预留太多等待时间。那时他还没来得及买电瓶车，没时间考虑，到路边刷开一辆共享单车就出发了。

我咬着牙，站起来使劲蹬，3.6公里5分钟就到了，和骑电瓶车用的时间差不多。就这样，翟一帆用共享单车创造了自己的骑行速度记录。

在酒店的附近，他放好自行车，强忍着就要喘出的粗气，平复呼吸，走到客人面前。客人点头示意，把钥匙递给他，然后坐进车里，中间没有一句交流。没人知道他刚刚的风驰电掣，没人问他的名字、细看他的样子，一切都像他想象的那样平常，我只是个代驾司机，我只需要完成自己的工作。

最初几天，翟一帆发现零点过后自己总是接不到派单。这个时段代驾需求量少，代驾司机需要主动向平台报单，才能保证自己的业务量。

他经常看到同行守在酒店门口，见到客人走出来，就凑上去，推销自己的代驾服务。

在过去的工作中，翟一帆也需要经常与客户打交道，但都是商务往来。大家坐在桌子前谈判，谁也不用降低姿态。

现在，看到近在咫尺的客户，他却拉不下脸，过不了心理关。

陈珂也把自己的新职业当作了秘密。3个月来，他没在同事群里透露过任何关于自己送外卖的信息，怕掉价。



陈珂在顾客小区楼下。



陈珂把外卖放入餐箱。



陈珂在送餐途中。

